

永不消逝的那道弯弯的虹

——W·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如何来到中国 □彭龄章 译

当阳光照射到空中悬浮的水珠，经过折射与反射作用形成的带状彩色圆弧叫作虹，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它绚丽多姿，常作为一种象征着喜庆、吉祥、欢悦、胜利的吉兆，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33年毛泽东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考察期间，重游4年前红军在瑞金城北大柏地一带重创敌军旧战场时，便借雨后彩虹的悦目景象，以《菩萨蛮》曲牌，写下大气磅礴又瑰丽多姿的《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苏联女作家W·瓦希列夫斯卡娅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也把它作为光明战胜黑暗，文明战胜野蛮、人道战胜暴力、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虹从东方向西方延伸着，像花瓣似的温润，柔和，纯净而灿烂的光带，把天与地连接起来。”灿烂的虹光，鼓舞、照耀着苏联人民，在前方，在敌后，英勇顽强地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瓦希列夫斯卡娅原籍波兰，1905年生于克拉科城郊，从小生活在工人聚居区，1914年一战爆发后又随祖母迁居农村，和农村孩子一起干农活，受冻挨饿，直到1917年冬，父母才将这“长野了”的孩子接到城里接受正规教育。但童年经历不仅培育了她坚强的个性，也让她深切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她在中学就开始写诗，读大学的时候，一方面参加学生与工人运动，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她反映波兰社会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小说《日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来又接连出版了《祖国》《大地的苦难》。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她徒步跋涉600公里，来到苏联，加入了苏联国籍。她除继续完成在波兰就开始写的长篇小说《池沼上的火焰》外，也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论文、小品和短篇小说。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后，她以记者身份，和红军战士并肩战斗。除创作《党证》（一个德国士兵的日记）《为了胜利》等一篇篇纪实性的报道外，积累了大量素材，特别令她感动的是各地农村妇女，为了胜利几乎奉献了一切：丈夫、儿子参加了红军或

游击队；粮食支援红军；或坚壁清野，甚至连好不容易盖起的住房、柴垛，也不惜一把火烧毁：“一粒粮，一根草也不留给德国鬼子，困死他们，饿死他们！”……后来，她听说一位叫亚历山德拉·戴曼丽的农妇，丈夫不幸阵亡，她怀着对敌人的憎恨参加了游击队。为不影响工作，她一直瞒着自己怀有身孕，总是奋力地工作：烧饭，洗衣，侦察……直到临产时才回到村里，却不幸被德寇虏去。敌人千方百计让她供出游击队的情报，却怎么也撬不开她的嘴。在严寒的冬夜，剥光她的衣服，用刺刀驱赶着要她指认哪家是游击队；她生下自己和丈夫盼了20年才怀上的唯一的儿子，敌人更利用母亲对儿子的怜爱，威逼利诱，也毫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她和她的儿子杀害，投到冰河里……瓦希列夫斯卡娅说：“戴曼丽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被苏联妇女的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震撼。”她沿途所见的那许许多多令她感动的妇女们的形象，在脑海中一下变得更加鲜活起来，使她不能自已，遂在戎马仓皇中着手创作《虹》。她说：“我写作时，几乎无须借助任何想象，因为作品中每个人物，都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只是将女英雄戴曼丽改成了娥林娜……”

《虹》以身怀六甲的娥林娜潜回村后被德寇虏去为主线展开，这是一个有300户人家的普通农村，家家青壮男子都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的尽是妇孺老弱。空场里的绞架上吊着被德寇处死的少年柳组克的尸体，成了侵略政权的象征。清早，老妈妈费多霞颤巍巍地挑着水桶到河边打水，雪地上横陈着一具被冻得僵硬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德寇不仅不许收尸，还把他的军大衣、军裤、皮靴剥去。那红军战士正是费多霞的儿子华西里！她每次去河边总要望着儿子灰白的脸，仿佛他可以听见似的，一声声轻唤着“好儿子……”她的房子被占领军为了顾尔泰上尉和奸头普霞——一个“为了丝袜和法国酒”便苟且偷生，出卖祖国、亲友和灵魂的无耻叛徒占据。老妈妈和村民们一样，不露声色地把刻骨的仇恨埋在心底。她坚信他们遭报应的一天总会来到。

《虹》最初发表在1942年八九月份的《消息报》上，父亲曹靖华读到从莫斯科寄来的剪报后，认为这不仅是一部“作者用心血凝成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奋勇抗击和德国法西斯一样的“最黑暗，最野蛮，最凶残的人类公敌”——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立即着手翻译。后又依据新收到的单行本，将译稿仔细增删校改。那时正值日寇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他为了赶译《虹》，常常是“紧急警报”响起才去防空洞。有一次刚出家门敌机已经临空，他灵机一动，一头钻进附近的废砖窑。防空洞人多、噪杂，又漆黑一片，而废砖窑僻静又安全，还不妨碍译书。从那以后，每当警报响起，他干脆拿起马扎和书稿去废砖窑。《虹》中不少章节都是在破砖窑译出的。1943年8月他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在赤日烁金的酷暑里，挥汗赶完这部译著，它尚能证明同胞抗战的意志，高扬同胞爱国热情，坚定同胞胜利的信念，这就是我最最大的愿望与喜悦了。”《虹》在苏联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体现了全体人民所需要的高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辉煌巨著，并荣膺194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虹》的中文译本在我国同样引起轰动，刘白羽、戈宝权、李何林、杨朔等人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与推介这部作品。周恩来回延安公干时，还特意带去了《虹》的中译本，及一部根据《虹》改编的电影拷贝，向延安及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推荐并放映。延安及晋冀鲁豫各出版机构也迅即将《虹》的译本翻印。一些没有印刷条件的地区，还用石刻钢板油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干部、群众，林伯渠同志回重庆时给父亲带去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翻印的他的译著中，就有手工油印的《虹》。我们手头现存资料中，有一篇1957年11期《解放军文艺》刊登的叶歌的文章《我们心底的彩虹》，作者说，1946年冬季，刚取得抗战胜利不久的各解放区军民，又不得不奋起抗击被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匪军的“重点进攻”。他们奉命从鲁中枣庄一线，直插敌后苏北宿迁，他在战斗中负伤转到鲁中的医院，在病房中和伤员们一起贪婪地读起

《虹》，他说：“一读到那些令人痛苦和愤怒的情节，一读到那些令人激动和赞叹的斗争，我们就恨不得立即返回前线。我们不能让千千万万的娥林娜、马兰、玛柳琪、米什卡……在敌人刺刀下受折磨、受凌辱、被杀害。”同病室一位叫同辉的副指导员，肩上的伤口有半尺多长，每当护士给他换药的时候，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涔涔冒出，他却一声不哼。他说：“比起娥林娜，这又算什么！”伤口刚愈合，他就要求重返前线，在临行前夜，他对室友们说：“《虹》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们现在撤离了临沂，撤离了延安……但我们的乡亲们并不比娥林娜、玛柳琪差。有这样的乡情，我们还愁什么呢？虹虽然没有出现在我们头上，却横在我们心底。同志们，让我们都能尽早地参加大反攻吧！让我们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再见吧！”

《虹》不仅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产生过巨大反响，在“国统区”同样拥有广大读者。特别是《虹》的电影在国内公映之后，不少大学中学的读书小组，都把《虹》列入必读的书籍之一。父亲也曾对我们说过一位成都女学生的故事：那位女学生读过《虹》后，被女英雄娥林娜坚韧的精神所震撼，她说：“我若遇到娥林娜那种情况，也会像她一样。”后来，这位立志献身革命的女学生，加入了共青团，经过西康干部学校的培训，担任了西昌盐中区的青年干事。一次在西昌征粮工作中，不幸被叛徒告密落入叛匪手中，她受尽严刑拷打直至牺牲，始终像娥林娜一样坚贞不屈。这位女学生，就是后来被认为共产党员的著名女英雄丁佑君。

当年，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确曾在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中，成为千千万万读者砥砺抗战意志、高扬爱国热情、坚定胜利信念的精神武器。尽管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随岁月流逝而飘散，尽管世界格局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节点上，重读这部小说，深感它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只有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只有不畏战争，才能维护和平。我们坚信，那从“东方向西方延伸着，像花瓣似的温润、柔和、纯净而灿烂的虹，把天与地连接起来”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文明战胜野蛮、人道战胜暴力、公理战胜强权的那道弯弯的虹，依旧激励着爱好正义、自由、和平的人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国古人认为中国四周都是海，所以有“海内”的说法，四海之内是中国，“海外”则指外国。这样的地理概念早已过时了，但词汇自有其稳定性，所以到外国去学习或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回国效力的人，便被称为海外归来者——“海归”。

出国求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唐朝的高僧玄奘曾经到西天（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学，前后17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律、论无不通，被称为“唐三藏”。玄奘在那边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受到普遍的尊敬，但他毅然回国，在首都长安的慈恩寺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凡75部1335卷，成就了一番空前伟大的事业。

要在中国古代的高僧中举出一个知名度最高的人物，那就非这位唐三藏莫属；尽管许多人特别是小朋友只是从电视剧或小说《西游记》中知道他的。

玄奘不仅是佛经翻译家，也是佛教理论家，他的看家理论被称为“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佛教史家认为，玄奘的主要贡献在翻译而在理论，在后一方面他实际上很不成功，且留下了老大的教训。赖永海先生《佛典辑要》一书写道——

由于玄奘的声名和唐太宗、唐高宗两位皇帝的大力支持，唯识宗在初唐曾盛极一时。但是，由于法相唯识学的理论思辨风格颇不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之，作为唯识宗家传秘法的“五种种性说”与当时已在中国非常盛行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潮流严重背离，不能为僧俗二界所接受，所以到了第三代传人慧沼时已只能守成，到了第四代智周手上，唯识宗的影响更小，此后便很快消亡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唯识宗”的祖师名号赫赫，又有两代皇帝大力支持，却未能有光明的前途；后来影响甚大的乃是“禅宗”，其关键人物六祖慧能原是一个小和尚，没有出国留过学，只是在黄梅五祖庙里担水劈柴；而他的理论却大得人心，影响之深远至今还能感受得到。就流行的程度而言，“唯识宗”同“禅宗”一比，不仅只是“小巫”，简直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有大师主持，有皇帝支持，而竟然较量不过一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和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合不合国情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真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沉潜歇绝。”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陈先生接着又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285页）

在中国，说道理做事情，非坚持中国特色不可，外来的东西必须以吸收改造，不能完全照搬——不管它是古代的“西天”，还是现在的西方。



玄览堂笔记

唐三藏的教训

□顾农

书籍的迷宫

□墨白

书籍构成人类精神的迷宫，人类创造的书籍像海洋一样浩瀚，书籍是人类构建精神迷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建筑材料。

博尔赫斯在《论书籍崇拜》一文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们是虚构的书本，是一首诗、一段话或一个字，而这没有终止的书本就是没有终止世界的惟一见证，确切地说，也就是世界本身……

当我们走进图书馆时，看着一排又一排的图书，我们会感到图书的浩瀚。一本书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是存在于这个与世不相关的世上的所有书籍中平平常常的一册，直至它遇到了它的读者，找到那个能领悟其象征的人。

从书籍里我们看到了人类那些已经失去的时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在时间里用文字书写，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放进了书籍里。这样，书籍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现实。博尔赫斯的现实就是对书籍的阅读，阅读就是对他人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博尔赫斯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书房里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父亲的藏书十分浩瀚，少年时期的阅读影响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后来在图书馆里做过图书管理员，就像哲人李耳一样，担任过拥有80万册图书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他仍然认为他父亲书房里的图书是浩瀚的。书籍是父亲给他的最大恩泽，书籍成为他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生命里的时间就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时一分一秒地流失的。可以这样说，书籍构成了他存在的一种形式，书籍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按照他对记忆和时间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书籍的阅读，就是我们存在的现实。然后，我们又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融入用文字构建的书籍里。

写作彰显了生命的意义，博尔赫斯先生说，我总是把从现实生活里得到的感受移到我的小说里。比如我在一个黄昏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

情景，都有可能置换成我小说里的人物所生存的背景。然后我把我的书，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我的《另一个，同一个》，或者一本别的什么书籍插进书架，和图书馆里那些原有的书籍混成一团，构成原来一条小径。书籍确实构成了一座让我们无法走出

的迷宫。就像博尔赫斯在《沙之书》里写到的那本沙之书一样，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有着无穷无尽的页码。

我们自己就是那书籍迷宫的制造者。博尔赫斯先生说，我们用书籍构成的迷宫，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隐喻。

书籍就是现实的存在，阅读本身就是生活。写作是扎根在书籍土壤里的树木，这只能是想象，而不是幻想。是想象给写作带来了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幻想。而书籍就是我们的记忆，书籍就是我们的历史，已失的现实深藏在我们熟悉的文字里。由书籍产生的灵感和文字，是有根之本，是想象，而不是幻想。即便是从哲学的意义来把博尔赫斯归为“幻想型”小说家，我认为也是不准确的。我们通过阅读，在对时间的认识上，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可以作为一个哲学话题来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说博尔赫斯从柏克萊的不可知论里、从休谟的循环时间里、从叔本华的惟我论里发现和认识了生活，但是博尔赫斯的哲学是最具有文学意味的哲学。他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把他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变成了形而下的现实，他是通过时间、记忆、镜子、沙粒、迷宫等等这些隐喻，赋予哲学以形象。他的小说是建立在人类哲学的命题之上，然后进入一些精神层面，从人性的角度来展开的。因而我认为他的小说是真实的。精神层面的真实，这是文学的根本。这种真实只能属于想象的范畴，而非是幻想的范畴。我们把时间、记忆等等看成是构成他小说宫殿的元素，书籍也是他小说宫殿里的一座单独的迷宫。



将军腰带

□陈世旭

因为家居的习惯，我穿运动衣的时候多。有位军队转业的朋友觉得我必要时还是该讲究一点仪表，于是送我一条他不再用的军用腰带。大约怕我不够重视，笑说：这可是将军腰带哦。

不久，我外出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慎重其事地上这条“将军腰带”。一帮人坐着闲聊的时候，细心的一个注意到这条腰带，我满脸得意地告曰：“将军腰带！”没想到惹起一片哗然：这哪是“将军腰带”！一位朋友立即从微信里翻出他的系着金光闪闪的真正“将军腰带”的岳父的照片，让我见识什么是“将军腰带”。在一片讪笑中我看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向自以为夹紧了做人的尾巴，还是得意忘形没有夹住。

自然，我这样的虚荣只是很浅薄的一种，后果也有限，最多就是自讨没趣而已。虚荣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对自己的能力、水平过高估计；处处炫耀自己的特长和成绩，喜欢听表扬，对批评恨之人骨；常在外人面前夸耀自己有权势的亲友；对上级拍马奉承；不懂装懂，班门弄斧，打肿脸充胖子；家境贫寒却大手大脚，摆阔气赶时髦；处处争强好胜，自命不凡；有失误即归咎他人，有缺点即寻找各种借口极力掩饰；对有才的人妒火中烧，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等等。

社会学家认为：虚荣心是一种扭曲的自尊心，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一种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是以虚假的方式来保护自尊的心理状态，是人们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的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和心理状态。虚荣貌似荣誉感强，但实际上是对道德荣誉的一种反动。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严重。事实上虚荣心是人类的一种普通心理状态，无论古今中外，无论男女老少，贫贱者有之，富贵者亦有之。谁没有自尊心？谁不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的心理需要没什么不正常。妄自尊大，渴求赞美，看重别人的评价；喜欢攀比，有表现欲乃至嫉妒心，男人追求名誉、地位、钞票，女人追求衣着、容貌、老公地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随时可以见到的众生相。

凡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虚荣，程度不一而已。虚荣心太强的人其实活得很累。诸如为了上镜、上榜、上位、不蒸馒头争口气，不惜卖身卖斯文，那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怜了。他们挣扎在自信和自卑之间，“死要面子活受罪”，不管收入、职业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冤枉花钱却效果相反，得不到别人欣赏，自己也不开心。当无法比别人强时，就在与别人的差距中感受折磨与痛苦，完全失掉了心灵的自由、独立和持久的快乐。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恐怕也没法指望人们像老子说的那样“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了。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而是不加抑制的虚荣心有可能导致非健康情感因素的滋生，以致失去从行为的社会价值来评价自己行为的能力，表现为可悲的甚至不道德的社会情感。对虚荣的变态追求，使社会浮夸成风，使个人丧失底线，不择手段，撒谎、投机、行贿、钩心斗角，以求使自己在强过别人的差距中获得快乐与满足，小则道德的沦丧，大则走向罪恶。一切恶行都有可能因虚荣而生。

因而，对虚荣心理的及时调整十分必要，最重要的是划清自尊心和虚荣心的界限，做一个诚实的人。腰带就只是腰带，能系住裤子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将军腰带还是士兵腰带，对一个常人来说，真有必要那么叫真？



竹篱石图 黄山寿作